

前公安部长王芳忆江青“18号案”

一封匿名信

1954年3月下旬,江青收到一封匿名信。匿名信是从上海发出的,由浙江省交际处处长唐为平转交江青收。

江青收到匿名信后,非常恼火,神情显得有些紧张和不安。第二天,江青找我谈,谈了一个上午,说自己青年时期就是一个非常进步、非常坚强的革命者,现在有人诬蔑她,是别有用心,是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江青还把匿名信递给我看了。我瞄了一眼,就不想再往下看了,把信递过去。

江青一脸严肃地说:“你不看谁看?这是一封反革命匿名信,你看清楚了,要给我破案。有人编造谎言诬陷我,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实际上是针对主席的。”

匿名信主要写的是她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一段风流丑事和被捕变节的历史问题,内容非常具体。写信人肯定对江青过去的历史十分清楚。因写信人深知江青30年代的历史及党内上层情况。

江青推断此人必是党内高干或文化界名人,或是他们的夫人。当时我理解写信人揭她老底,挖她疮疤,是对她如今贵为第一夫人的骄横作风非常不满,向她提出警告和批评,要她识相一点,不要太张狂。

江青给我看了匿名信后,突然问我:“你熟悉扬帆吗?”我当时对她的发问毫无警觉,随口就说:“解放前,我是八路军,他是新四军。解放后,他在上海当公安局局长,我们来往比较多,关系较密切。”

听我这样一说,江青就有点不高兴,半阴半阳地说:“你

知道他过去叫什么名字?他过去不叫扬帆,叫殷杨。在国民党南京剧专工作过。”

被列为“18号案”

上世纪30年代,扬帆按照党的指示,以记者的公开身份,在上海“左联”从事文化救亡运动。因此,他对江青在上海曾经被国民党逮捕变节自首,和生活上的风流丑闻、复杂的社会关系了如指掌。

时任新四军政委的项英同志听说毛主席要和江青结婚,出于对党的忠诚和负责,要扬帆整理一份有关江青在上海那段历史问题的材料,以项英的名义,用密电向延安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报告最后直言不讳地写道:“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报告按照行文常规,注明材料来源——是曾经在上海搞过文化救亡运动、现任军部秘书扬帆同志提供的。

不幸的是这份报告落入了当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手里。善于投机的康生出于他的政治目的,把这份报告交给了也在社会部工作的江青。毛主席当然不会看到这个报告。

江青为了出这口气,在康生的直接指使下,先后两次将扬帆下狱。第一次在延安整风运动后的1943年10月。幸亏负责审查扬帆所谓历史问题的是中央华中局社会部部长潘汉年同志,他顶住康生的压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扬帆被关了10个月,最后放了出来。

1955年元旦,扬帆第二次被捕,扣上了“反革命”、“特务”的帽子,长期关押,受尽折磨。与此同时,潘汉年被戴上了包庇扬帆的罪名,成了“潘扬反革命集团”的首要成员,在

王芳,前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是一位传奇式人物:他担任过毛主席“大警卫员”;熟知江青不可告人的丑史;参加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审查工作。出于职业习惯,王芳对自己的过去守口如瓶。如今,为保存珍贵史料,王芳回首往事,讲述鲜为人知的经历——

►王芳



1955年3月被捕入狱。一直到20多年后“四人帮”垮台,潘汉年和扬帆才得以平反。然而,此时潘汉年已死于劳改农场,扬帆早已被逼疯了,就连来劳改农场接他回家的妻子儿女也相见不相识了。

在谈了扬帆之后,过了一会,江青又问我,“你认识覃晓晴吗?”

覃晓晴是浙江省妇联福利部副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彭柏山的妻子,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地下党员。是浙江省省长沙文汉把她调来浙江工作的。

我的脑子又从对扬帆往事的回忆中回到眼前。我说:“覃晓晴就在省妇联工作,我知道她,但不是很熟悉,听说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女同志。”

当时我只知道,扬帆在新四军军部工作时,曾经整理过江青在上海那一段历史问题材料的事,不知道覃晓晴和江青之间

还有什么隐秘的事。后来我了解到,1934年江青在上海被捕时,覃和江同住一个牢房。覃回忆自己被捕原因,是因为江青首先被捕,在敌人面前供出了她。而江青后来说了谎,特务来逮捕她时,她已搬家了,因此,覃晓晴被捕了,她没有被捕。

据查,江青关押在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由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赵耀珊(绰号“黑大汉”“黑大个”)在公安局特务股楼上审问。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编审组长先大启也参加了审讯。

后来我才意识到,江青知道她熟悉扬帆和覃晓晴时,为什么不高兴,神态很不自然。

当她问到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特务赵耀珊时,我警觉起来,不再说什么。我知道,赵是当年审讯江青的特务。江青怕他还活着。我只说,赵耀珊在南京镇压反革命时被枪毙了。她一直阴沉

的脸,这才才有了一点笑容。

江青回到北京,立即将匿名信的事报告了毛主席。说这是一起性质严重的反革命案件,要公安机关立即组织侦破。主席认为这不是什么反革命案件,可能是你工作不虚心,得罪什么人,是对你不满,有意见引起的。当时正好是解决“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七届三中全会以后。江青一定要将这匿名信事件和那附政治斗争形势挂起钩来。后来主席没有再说反对意见,也就是默认了。

动用了主席的权威,这一匿名信案(被列为“18号案”)的侦查工作也就升级了。

侦破工作秘密进行

由于匿名信信封上印有“华东文委”字样,江青要公安部门将侦查的重点放在上海的党政部门与文艺界。

不久,中共中央华东局在上海召开会议。会议由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同志主持,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陈毅同志出席,还有我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同志参加,确定把这封匿名信事件作为一个特大案件来侦查。会议确定,“18号案”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负责,上海方面由黄赤波负责,浙江方面由我负责。会议对案件进行了具体分析,把重点对象放在30年代曾在上海文艺界工作过的人员身上。

侦破工作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亲自抓案件的侦破工作,每隔几天就要听取一次汇报。

当时,专案组先后收集了800多人的笔迹,进行了笔迹鉴定。当时受侦查时间最长,怀

疑最多的是原上海市文化局局长赖少其的妻子曾菲。事情是由她的丈夫赖少其引起的。赖少其在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上提过一个议案,要求组织上对贺子珍的生活给予照顾。

江青极其忌恨贺子珍。公安部门注意赖少其后又发现,赖少其的妻子曾菲与贺子珍一家关系密切,并且对贺子珍的处境深表同情,而且对毛泽东1952年在上海没有与贺子珍女儿李敏见面一事颇有微词。另外,赖少其又恰好是在华东文委工作!

专案组人员向柯庆施汇报之后,柯庆施认为曾菲“有作案的条件和思想基础”。于是公安部门找来曾菲的笔迹。经过鉴定,曾菲的笔迹竟然与匿名信的笔迹很相似!于是,曾菲成了重点怀疑和审查对象。然而,对曾菲进行了诸多秘密侦查后,始终未发现任何证据。

其间,江青催问了多次,她显然对案件迟迟侦破不了,感到不满意。一直到1961年,一次偶然的事情中,查明了给江青写匿名信的人,原来是林伯渠的妻子朱明。

林伯渠去世之后,朱明给中央写信,反映有关林伯渠死后一些遗留问题。一查对,两封信的笔迹一模一样。朱明承认匿名信是她写的,并立即自杀。虽然朱明自杀身亡,但是在“文革”中,“四人帮”一伙仍将朱明定为“反革命分子”。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对朱明的问题重新进行了审查,并作出结论:朱明“给江青的信的内容没有错误,原定其为反革命分子是错误的,纯属冤案,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文史博览》

乘轮椅越过千山 只为见截瘫知己



同病相怜的杨洪清(左)和朱耀明

湖北省竹山县男青年朱耀明在铁矿打工时突遇矿难,高位截瘫。痛别大学校园后,他以惊人的毅力写出了38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已发表250多万字,其中多篇作品获奖;贵州女青年杨洪清自幼患病瘫痪,初中毕业后,她自学写作也发表了许多文章。

杨洪清得知朱耀明的传奇经历后,被他顽强执着的精神所感动,不远千里从贵州赶到湖北省竹山县,以好朋友的身份悉心照料朱耀明近一年时间。

痛失双腿

1976年,朱耀明出生在湖北省竹山县擂鼓镇西河村一个贫困的家庭。从初中起,懂事的朱耀明就开始趁着暑假空当,和老乡一起到十堰市、襄樊市等地的建筑工地上提灰桶、搭架子,挣些学费。

1996年,20岁的朱耀明以570多分的成绩考入北京一所名牌大学。消息传来,西河村顿时沸腾了!面对昂贵的学费,一家人愁眉苦脸。朱耀明放弃了北京求学的机会,径直走进十堰市教育学院。

为了凑齐几千元学费,第二年暑假,他随同老乡又去千里之外的河北一家铁矿打工。毫无经验的朱耀明到了铁矿后,被安排在矿内巷道给炮工捉炮杆。

眼看暑假已经过去了一半,那个让他终身难忘的黑色日子突然噩梦般扑来了!那天下午,朱耀明和一名工友正配合着打炮眼。像往常一样,他蹲在前面的地上双手牢牢捉住炮杆,后面的工友则扶着风钻“轰隆隆”地钻孔。没过多久,只听一声巨响,可怕的塌方发生了!

瞬间,坚硬的石块呼啸而来,没来得及躲闪的朱耀明被滚滚落下的石块齐胸埋住。几分钟后,工友们赶到现场,如同拔萝卜一样,七手八脚地将他从石块中拽出,然后赶紧送往医院。一周后,父亲朱仕奇从老家赶来,见到残疾的儿子,父子俩忍不住在病床上抱头痛哭。

虽然几经交涉,矿主仍坚持给一万元医疗费了结此事。朱仕奇只能抹着眼泪,背着儿子回到了老家。家人卖掉了维系生活的生猪、耕牛,又东拼西凑了两万元,把朱耀明送到十堰市实施手术。手术非常成功,朱耀明已无生命危险,但由于腰椎神经断裂,腰部以下的部位却全部失去知觉,他的双腿也从此名存实亡。

卧床写作

从医院回到家,朱耀明整日以泪洗面。父母看到儿子生不如死的痛苦样子,心如刀绞。昔日的同学闻讯后,纷纷登门看望。看到这么多热心人不断给自己以安慰,朱耀明渐渐地冷静下来,彻底放弃了轻生。

一天,朱耀明忽然萌发了自己动手写作的念头。1997年冬天,他开始提笔,步入了漫长的轮椅文学。他如醉如痴地畅游在文学海洋中,忘记了白天与黑夜,以高中时期练就的扎实文字功底,写下了一篇篇焕发青春气息,使人荡气回肠的《山村的小贩》《稻子熟了》、《麦收时节》等文学作品。

从2000年起,他开始往外投稿。当年,他的小说《醉》从一万多篇稿件中脱颖而出,荣获湖北省作协文学院举办的“黄鹤杯”全国征文比赛三等奖;同年底,他的小说在《星星

文学》全国征文赛中获得二等奖。

2001年,朱耀明先后创作了《堵河风云录》《剑》等80多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2002年春节前,他创作的一首长诗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全国诗歌大奖赛中再次获奖。第二年,凭着扎实的文学底蕴和丰硕的成果,朱耀明入选十堰市作家协会。

2005年冬天,共青团十堰市委给他赠送了电脑,鼓励其继续在文学的创作道路上快步飞翔。

精神的振奋,渴望新生活的激情,使他的创作主题更加开阔,艺术技巧更趋成熟。几年来,他以惊人的毅力写出了380多万字文学作品,已发表250多万字,其中《稻子熟了》《麦收时节》等多篇作品在国家、省级文学大赛中获奖。

千里相见

朱耀明的事迹很快传遍了神州。一时间,全国各地的热心人纷纷给他寄来热情洋溢的鼓励信。在数以万计的来信中,女青年杨洪清的来信让朱耀明找到了知音。

1984年5月,杨洪清出生在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的一个普通家庭。她出生时腰间有一个隆起的小包。3个月后,医生诊断为“先天性双下肢瘫痪”。初中毕业后,依靠轮椅行走的杨洪清选择了文学,开始自学写作。2004年4月,她的一篇短文《做自己的心理医生》被《中国残疾人》杂志采用发表后,陆续收到了山东、河北、北京等地读者朋友热情的来信。后来,又有《追梦》等多篇文学作品发表。

共同的爱好让两位同病相怜的残疾青年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相互书信往来了两年,杨洪清渐渐萌发了去湖北看望朱耀明的念头,但由于行动不便,迟迟未能付诸实现。

2006年5月,朱耀明在父母的资助下,从西河村搬到了擂鼓镇。在擂鼓镇中心学校对面,他租下一间门面经营着日杂。由于生意不好,一天只能卖出10多块钱的东西,他便抽空摆弄床头的电脑。渐渐的,他不仅熟练地学会了文字编程,还学会了简单维修。

2006年7月16日,天空中下着蒙蒙细雨。杨洪清在两位同学的帮助下,从武汉辗转来到十堰市后,又马不停蹄地踏上了前往竹山县擂鼓镇的汽车。两人一见如故,聊得非常投机。

杨洪清和同学们在这里住了两天后,准备一起返回武汉找工作时,朱耀明突然感冒发烧了。善良的杨洪清不假思索地对同学说:“你们先回武汉!他病了,我不能撒手不管。”

患难与共

杨洪清以一个好朋友的身份悉心照料着朱耀明。一晃,时间过去了近一年。

在这漫长又短暂的日子里,杨洪清每天帮忙做饭、看店,并向朱耀明学习文学创作和电脑技术。而朱耀明从她那里又学会了上网,还申请了QQ号,并设置了电子信箱。

与朱耀明相比,杨洪清只是膝盖以下的部位没有知觉。2006年11月,杨洪清同学从武汉打来电话说,给她找了份电子商务网站的工作,每天的工作任务就是发送电子邮件,

非常轻松。

那时,只能躺在床上的朱耀明,褥疮还很严重,每天都要换药。杨洪清当即就在电话中谢绝了同学的好意。

2007年2月3日,眼看就要临近春节了。为了准备年货,当天上午,朱耀明缓缓挪动着身子,爬上了残疾人专用摩托车去附近的宝丰镇进货。出一次门很不容易,杨洪清也兴高采烈地爬到后面的座位上。行不多远,当这辆三轮摩托车行驶到一处下坡路段时,一辆相向而行的小轿车突然方向一摆,狠狠地撞向了他们的摩托车。

“咚”一声,后座上瘦弱的杨洪清突然摔了下来。顿时,朱耀明惊出一身冷汗,回头一看,杨洪清正坐在地上一边拍打着身上的灰尘,一边淡淡地笑着。

2007年3月12日上午,记者来到擂鼓镇朱耀明经营的小店。他正忙着用电脑给附近的小学设计“寄宿学生点名册”。整个上午,记者观察到,小店只卖出了一包香烟和一包卫生纸,所卖总收入是6.5元,仅赚8毛钱。

记者采访时得知,朱耀明的生活依然很艰难。由于近来的健康每况愈下,已很久没有创作了,他很想把以前的作品通过出版社出版,但数万元的费用始终让他望而却步。

从记者来访,杨洪清摇着轮椅从里屋出来。口齿伶俐的她,笑着告诉记者:“过几天,我就要回贵州老家了……在和朱耀明的学习、相处中,我明白了坚强是生存的必需,自强的内涵就是自己开导自己、鼓励自己、安慰自己、鞭策自己。”

(谢绝转载,上网) 朱江